



浙江工商大学文化精品研究工程

改革开放40周年浙商研究院智库丛书

『撤村建居』

“撤村建居”

人的现代化和社区融合

马良陶莺 / 著

如何实现“撤村建居”的终极目标

“撤村建居”社区缘何沦为最难彻底城市化的社区？

怎样完成“撤村建居”社区的组织再造与秩序重建？

如何实现“撤村建居”的终极目标——“人的城市化”？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 浙江工商大学文化精品研究工程

■ 改革开放40周年浙商研究院智库丛书

“撤村建居”

人的现代化和社区融合

马 良 陶 莺 /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杭州



■ 浙江工商大学文化精品研究工程

■ 改革开放40周年浙商研究院智库丛书

上架建议 社区建设/城市化

ISBN 978-7-5178-3072-6



9 787517 830726 >

定价：53.80元

丛书编委会

总 主 编：陈寿灿

副总主编：李 军

副 主 编：范 钧 鲍观明 吴 波

编 委（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于希勇 马 良 马淑琴 王江杭 刘 杰

肖 亮 余福茂 周鸿承 姜 勇 宫云维

徐 锋 徐越倩 高 燕 陶 莺 黎 常

总 序

当代中国社会 40 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与当代浙江发展的“浙江模式”及当代浙商的成长是一个相互辉映、互促互进的动态历史进程。一方面,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伟大进程既成就了当代“浙江模式”的发展奇迹,也成就了当代浙商的辉煌,并因此成为考察“浙江模式”与浙商成就的基础视界;另一方面,当代“浙江模式”与浙商以其自身的耀眼成就与成长轨迹诠释了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时代特点,涉及各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结构性样态与转型范式。与之相应的是,作为改革开放之潮头阵地的浙江经济及作为改革开放之急先锋的浙商所代表的发展理念、未来趋势也在某种程度上指明了当代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可能方向。

所谓“浙江模式”,是指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及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发源于“温州模式”的以市场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及服务型地方政府建设为特征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具活力的经济模式。“浙江模式”的最主要特色在于创新——特别是通过民间尝试性制度创新——形成了民间投资、民间运营和民间分享的“民有、民营、民享”的自我循环体系,型塑了内生型的自组织的生长动力系统,并在结合社会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创新的基础上,较早且较为系统地解决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企业改制与产权改革等问题。可以说,“浙江模式”极为动态地呈现了经济体制改革图景中社会发展的内生型逻辑:一方面,制度变革首先为个体私营经济、民营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并因此成为促进当代中国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发展的直接力量;另一方面,基于个体创业或集体创业的浙江个

体私营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实践,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并为制度变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实践依据,从而成为推动制度变革的积极力量。

20世纪90年代以后,“温州模式”扩展至台州、宁波、绍兴、金华和杭州等地。进入21世纪,“浙江模式”又率先在乡村振兴、电子商务、海外并购、绿色金融等领域迅速发展,极大地拓展了“浙江模式”的恢宏图景,不但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道路开创与引领方面有所建树,更重要的是,“浙江模式”还在当代中国发展的“中国经验”的型构中,为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有益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的战略借鉴。因为,在本质上,“浙江模式”代表的是新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方向与策略指引下的市场经济,而“浙江模式”的成功代表了中国道路与中国方案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当代浙商是浙江模式的最先锋力量,他们因特色的发展道路与辉煌的成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经济领域最引人瞩目的群体。当代浙商,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即改革开放初期,在80年代商品经济和市场发育的进程中积聚了最初的资本力量;而后,在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建构的实践中迅速成长,并伴随着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企业改制、产权改革等一系列的改革绘就了恢宏的浙商新画卷。当代浙商在90年代之前的发展历程,最为生动地呈现了他们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我发展、自强不息的“四自精神”。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代浙商又成为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先锋力量,迅速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积极布局,在世界创业与全球并购中崭露头角。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进程中,当代浙商因其在国内外众多经济热点领域中的活跃表现与巨大成就而成为被公众广泛认可的地域性商帮。它既充分诠释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又深刻揭示了作为浙商成长的“浙江模式”的实践价值。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不论是当代浙江经济发展的“浙江模式”还是当代浙商创造的巨大成就,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支撑与引领。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精神》一书中阐明了一个关于经济发展与文化支撑的真理性命题,即“任何形态的经济发展都必定内蕴了特定的文化力支撑,缺少这种文化力的支撑,任何形态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获得持续的生命力”。这一命题说明,当代浙江经济发展必定基于特定的文化力支撑,毫无疑问,浙学传统才是浙商文化、浙江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而浙学传统所代表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性学术,因为,无论是从其学术要旨的维度还是从其学术的实践精神维度考察,浙学传统所代表的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与创新性发展,并在这种承继与创新性发展中成就独特的浙商精神,其要旨有三:①以义和利的义利观。浙商精神中的以义和利的义利观既是对儒家传统的义利观的继承,又在永嘉事功学说的基础上有所开掘:一方面,永嘉事功学说的基本旨趣在于经世致用,它承继了二程的“义为利之和”的义利观,强调义和利并没有绝对的分别,即所谓的“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另一方面,永嘉事功学说虽提倡事功趣向,但其事功并非以个体功利为目标,并非如道学家所批判的“坐在利欲的胶漆盆中”那样,而是始终把国家民族的社会公利置于私利之上。叶适所倡导的即是“明大义,求公心,图大事,立定论”的“公利主义”精神。②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核心要旨,一方面它强调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反对把知与行截然二分化。故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另一方面,阳明心学的知行与道德是高度一致的,在四句教中就有“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故此,其知行观内蕴了深刻的道德追求。正是这种以知善为善行的取向成就了浙商的儒商气度。③包容开放精神。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两宋以来,浙学绝非只意味着狭隘的地域性文化发展:永嘉学派、金华的婺学代表了儒家文化在浙江的传承与发展;象山心学虽盛于赣,但象山之后心学的最盛况发展却仍在浙江,先有甬上心学承象山衣钵,后有阳明心学之气象大成。朱氏闽学源于且盛于福建,但朱熹之后,闽学在黄榦之后便转向浙江,黄震是闽学在浙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也是闽学后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由此不难看出,浙学发展最为完美地体现了创新与融汇乃是成就学术气象的根本。

在浙学激荡成长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浙江精神、浙商传统也因此成为最富于包容与开放的精神。

值此当代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之际,我们推出“改革开放 40 周年浙商研究院智库丛书”,拟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恢宏图景中审视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浙江模式”“浙江经验”与“浙商精神”,既在历史的回溯与反思中深究未来浙江发展的应然方向与实践路径,又在“浙江模式”“浙江经验”与“浙商精神”的系统阐述中挖掘后发地区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与实践经验。收入本丛书的研究成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浙江经济发展研究与浙商研究,它们不求面面俱到,但求视界独特;不求论述系统,但求思想创进;它们既着眼于揭示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与浙商精神的文化真谛,又努力澄清人们在相关问题上的认知误区。

《中国范本:改革开放 40 年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的理路与成就》一书通过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义乌市场的发展历程,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的确立与进展;“一带一路”背景下义乌市场竞争新支点、电子商务与物流业的新发展等内容,展现了义乌打造国际贸易综合改革的创新之路。《以利养义:改革开放 40 年浙商参与公益研究》则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完善的视角解读了浙商及其文化,并从企业家的社会效应维度审视了浙商的公益参与,阐明了浙商的公益参与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模式:中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实践与创新经验》在全面回顾当代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电子商务及跨境电商发展历程、趋势与动因的基础上,从微观、中观和宏观的角度系统阐述了跨境电商相关理论;在总结我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背景与历程、试点方案、试点成效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业务模式、“单一窗口”、产业园区、物流模式、制度创新的角度系统阐述了我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的主要内容和实践创新,并从杭州、宁波、义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建设背景与基础、现状与问题、成效与对策的角度总结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的浙江经验。《治理转型:浙江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主要论述了浙江省服务型政府建设在简政放权、规制权力、效率提升和民生保障等方面的经

验,并提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未来趋向。《“撤村建居”:人的现代化和社区融合》一书以多元中心的理论为主导,主要探讨了“撤村建居”社区的基层社会治理以及基层社区重建与“城市化”建设方面的重要问题,阐明了突破“城乡二元分治”的基本路径及如何通过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实现“人的城市化”等问题。《健康浙江:社会健康治理的方法与实践》一书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为背景,系统梳理了“健康中国”发展的主要脉络,并在中日社区健康教育比较的基础上,阐述了浙江杭州市 30 个街道、300 个社区在社区健康教育方面的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阐明了将社会工作方法融入公共健康教育,以及从以卫生管理与控制为目的的行政主导型健康教育到个人自发参与学习的以居民需求为核心的公共卫生健康教育发展的实践路径。《浙商与制度环境的共生演化:企业家精神配置的视角》一书基于企业家精神配置理论,对转型经济背景下浙商的行为进行解释,构建了企业家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分析框架,并在总结不同时期浙商成长路径、机制和模式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诠释了浙商 40 年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行为。《浙学传统与浙商精神》深入探究了浙江思想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阐明了浙江文化与浙学思想传统及浙江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并揭示了浙学的基本精神对当代浙江乃至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和普遍意义,以及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商业史研究 40 年》是第一部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业史研究的学术总结类专著,作者系统梳理了近 40 年来的中国商业史研究及其走向,并简要介绍了相关的研究论著、研究团体和研究机构等。《南宋临安商业史资料整理与研究》通过对正史、地方志、笔记小说等有关南宋临安商业资料的整理,深入研究了南宋临安的商业状况,再现了 700 多年前杭州商业的繁荣盛况。《朝廷之厨:杭州运河文化与漕运史研究》一书通过中西方历史文献、档案资料的比较研究,立体地呈现了杭州历史上的漕运文化的历史变迁、演变特征与区域特点,并在大力倡议“一带一路”及大运河文化带构建的时代背景下,探讨杭州漕运文化的历史遗产价值。《〈童子鸣集〉笺注》在对《童子鸣集》进行点校的基础上,对童珮生平及交游进行

了翔实的考证,并将相关成果以笺注形式呈现,在为学界提供扎实可靠的古籍整理文本方面有所建树。

整体地看,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40年,也是浙江经验、“浙江模式”发展的40年。“浙江模式”并不意味着一个固定的产业模式,作为一种具有典范性的发展模式,“浙江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每一发展阶段都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与旗帜,这里既体现了浙商的创新进取精神,也体现了浙商精神与浙学传统在当代浙江发展中的文化力,而这种创新进取的浙商精神与浙学传统的文化力恰是未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的动力源泉!

是为序。

陳青川

2018年10月30日

本著作是以下项目资助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规划基金项目：基于“多元中心”治理模式下的“撤村建居”社区公共服务和社区组织发育途径及机制研究(编号：09YJA840036)

前 言

2018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既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党的“十九大”之后的开局年;2018年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年份,从国际局面来看,以“中美贸易战”为主导的形势压力巨大,从国内发展来看,以“三大攻坚战”为主导的任务艰巨,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一中、二中和三中全会精神,为实现“两个百年”伟大目标努力奋斗。很明显,党的“十九大”把“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这对深化政府职能转型,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提出了更高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法治保障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这就讲明了一个问题: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是什么?一是“社区”。基层社区建设的实质也应围绕政府组织、党的组织、经济组织、社区中介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等之间的权利关系的协调来寻找制度创新的突破口。当前,在整个社会治理格局中,基层社会治理重心向社区转移是一种发展趋势,社区建设的目标是要为社区中的每个居民提供最具有“个体适当性”的自治机会和发展空间,其工作重点是推进公共产品的均衡化和推进基层民主自治^①。社区成为公民利用公共空间参与社会发展进程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最有效

^①彼得·德鲁克:《城市文明化》,载德鲁克基金会主编:《未来的社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1—4。

的途径和渠道,社区不仅是一个公民居住的场所,也是公民参与政治实践和发育利他主义公民意识的场所。社区的核心是“精神共同体”。二是基层政府的治理要构建和谐社会,社区是社会最基层的“细胞”。面对日益多元化和异质性的民众需求,政府的行政管理和处置难以达成有效满足。政府应转变职能,从行政管理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将成为沟通政府、基层民众和社会组织之间的“桥梁”,直接体现出“适度普惠”社会福利体系的基本要求,这不仅能构建基础性的社会秩序,而且能够增量社区社会资本,从基层社区开始来重建社会信任^①。

政府和社区双向互动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现代众多社会问题无法单一依靠经济发展来解决,随着社会问题的尖锐化,这些社会问题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要从深层次来解决社会问题,必然要依靠社会治理创新。推进中国社会建设,特别是加大整个社会的“福利投资”,不仅有利于实现由简单体力劳动者向综合能力高的劳动者的转变,给经济发展带来“新动力”,而且有利于实现由传统的“个体性”社会向现代“利他主义社群性”社会转向,给社会发展奠定稳定的基础。同时,面对公共服务领域内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社区作为最基层的社会性组织,其参与公共事务治理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法国政治学家比埃尔·卡蓝默指出:“一个强加于人、凌驾于社会之上、能够实现发展的国家形象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采取一种更加客观的观念来审视公共行动、统合各种社会力量的条件。因此,国家和其他行动者的合作伙伴关系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②社区是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基础环节,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交会点和聚集点。从公共管理角度看,它是城市管理的“神经末梢”;从政府权力的角度看,它是国家行政权力在城市最底层的延续,是城市公共权力的起点与发展基础;从利他

^①英格拉姆:《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模式》,载《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62—63页。

^②比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6页。

主义公民责任的角度看,社区是利他主义精神培育和社会组织的发源地^①。现代社会的“转型升级”,不仅是经济增长模式的变革,更加重要的是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

一、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理论意义

第一,基层社区治理是实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主要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要解决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要贯彻“五位一体”均衡发展的总体战略,尤其要加快社会建设的发展速度。

更进一步来说,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指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 and 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基层社区治理的加强,尤其是基层社区治理中的“三社联动”,有利于推进基层民主全面落实,推进基层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体系的形成,推进对弱势群体的精准帮扶,保障社会公平公正,从而赋予广大民众更高的社会安全感和良好的社会治理环境。因此,习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②

第二,基层社区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首先,社会建设要落实基本公共服务,搞好民生工程,这就是党的“十九大”中提到的“七个有”: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和弱有所扶。基层社区治理就是要基层牢牢守住“民生底线”,通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养老服务发展等实现民生工程,保护基层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和基本发展权。习总书

^①杨团:《社区公共服务论析》,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2—74页。

^②《习近平: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人民网,2016年3月5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305/c1024-28174494.html>。

记也指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①,基层社区治理立足于基层社区,“加强社区服务能力建设,更好为群众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②。

其次,社会建设就是要创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搞好民主工程。做好基层民主工作,就是要落实民主工程,推进社会组织发展,确立基层群众社会参与的主体性地位。“党委领导”是关键,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还要全面促进党和群众密切联系;“政府负责”是基础,做民生工程,政府要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协同”是桥梁,要转型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就要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形成政府和社会组织全面协同创新;“公众参与”是目标,要确立基层民众参与的主体性地位,要体现“公众性”特征,提升基层民众参与的组织化;“法治保障”是归宿,法治不是为了管理,而是为了保护,保护广大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保护合法利益不受侵犯,高水平的民主和高水平的法治是相辅相成的。

第三,基层社区治理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构建中,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要靠“三社联动”助推基层社区治理:(1)基层社区建设中,社区居民委员会属于基层群众自治性的社会组织,而街道乡镇属于基层政府组织,两者之间不应该存在“上下级领导关系”,因此,在未来社区建设过程中必然要走“去行政化”的发展路径;(2)基层社会组织发展是确立基层民众参与主体性地位的组织保证,基层群众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不仅有利于建设基层民主,而且有利于基层民众参与回归理性化和法治化,推动基层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3)推动基层社区和基层社会组织提高专业化水平,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是渗透到社会福利各个领域的,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能提供治

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3日。

②《在湖北考察长江经济发展的经济运行情况 习近平:奋力谱写新时代湖北发展新篇章》,《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4月30日,第2版。

疗性、成长性和发展性服务。

第四,基层社区治理是基层社会资本增量的有效路径。20世纪50年代,布迪厄首先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后由罗·普特南集大成。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形成的诚信、利他主义社会支持网络本身就是一种资本,而且是21世纪最具有竞争力的资本”。显然,社会资本有别于传统自然资源(土地、矿产资源等)、经济资本(金钱等)和人力资本(科学技术等),它是一种人际网络和人际支持,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为社会资本效应的发挥提供了技术性基础,诚信和利他主义行为是这种资本的最大特征,当前的“区块链”技术则是这种资本作用的显现。社会资本增量的路径是政府的社会福利、基层社会组织发展和基层社区建设。因此,基层社区治理是基层社会资本投资的重要路径。

第五,基层社区治理要做到“减负增效”,就是要创新“三社联动”。政府“简政放权”,减少制度性成本,是基层社区治理“减负”最重要的内容,基层群众有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基层社区治理“增效”,就是要提升基层的社会公平和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输送效率,增强基层能力建设;就是要推进专业社会组织发展,通过政府购买提供专业服务;就是要完善基层民主自治组织发育,提升基层民主自治空间,基层民众的“自组织化”程度大幅度提升;就是要推进基层社区备案性社会组织发展,完善居民互助自主的社区志愿服务体系,降低政府社区治理成本。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和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则是架起社区建设和社会组织发展之间的桥梁,社区建设“去行政化”和社会组织“专业化”必须导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

第六,“撤村建居”社区治理创新实际上还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示范工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乡村振兴的目标是实现“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很显然,乡村振兴就是要推进“以城带乡”,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发展战略,通过乡村振兴,使广大农村居民在知识储备、财富准备和心理准备上能够真正融入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就目前而言,2017年全国的城市化率

大约为 58%，还有大约 42% 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中国的城市化显然还要向前推进，大量的农村人口还要进入城市，乡村振兴战略实际上也是新一轮城市化的必然要求。“撤村建居”社区治理恰恰是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市民，农村生活方式变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

二、基层社区治理的实践意义

第一，基层社区治理内容创新上，不仅要注重物质性帮扶，还要注重服务性导入。现代基层社区治理在基础物质性帮扶服务体系过程中，还要更加重视发展型的服务。例如，对基层民主中村规民约等“软约束力”的重视，对低保户家庭如何走出低保困境的能力建设等的重视，这将为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发展带来巨大空间。

第二，基层社区治理着力点在创新上，社区建设要导入专业社会工作方法。专业化的社区工作主要围绕社区组织发展和社区经济发展。社区组织发展是确立基层民众参与主体性地位的组织保证，也是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推进社区建设的组织载体；社区经济发展是让社区具有自我造血功能即社会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其目标是提升相对弱势的居民的社区参与能力，社会企业的属性是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公益性目标。未来社区建设要进入 3.0 时代，社区建设要突破原来“三位一体”（社区党组织、社区公共服务站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体制中“政社不分”的行政化格局，社区居民委员会要回归基层民主自治的主体，尤其要推进基层社区建设的考核指标转向，由原来的以政府行政考核为主导转向以社区需求为主导，这种社区需求就是要实现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推进社区社会资本的增量。基层社区建设要摆脱经验化路径，走专业化发展之路，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导入已成必然。逐步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是当前的目标。

第三，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重点工作之一是大力推进基层社会组织发展。从广义上而言，社会组织主要涉及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三大类。对于基层社区治理而言，基层社会组织主要指基层专业服务组织、基层民主自治组织和基层社区备案社会组织。基层专